

YUYAN HE
WENHUA

语言和文化
和

汪大昌 著
首都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 组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语言和文化

汪大昌 著

首都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 组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和文化 / 汪大昌著 . — 北京 :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9. 5
ISBN 978-7-81119-676-4

I. 语… II. 汪… III. 文化语言学 - 研究 IV. 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3197 号

YUYAN HE WENHUA

语言和文化

汪大昌 著

责任编辑 王 冲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cnuph. com. cn

E-mail master @ cnuph. com. 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 5

字 数 274 千

定 价 31. 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目 录

绪言	1
第一章 语言和文化	3
1.1 语言中的文化因素	3
1.2 “萨丕尔-沃尔夫假设”	6
1.3 语言学的深入全面研究	9
第二章 文化交流与语言交流	13
2.1 外来文化对汉语的影响	14
2.1.1 音译词的大量出现	14
2.1.2 外来文化背景下的同形词	18
2.1.3 剩余语素开始出现	20
2.2 日文问题	23
2.2.1 日文借用古代汉语词汇构成的新词	24
2.2.2 日文借用汉字组合构成的新词	26
2.2.3 日文借用汉字部件构成日文汉字	28
2.3 中国（汉）语言和文化对外语的影响	30
2.3.1 “中国”在外语中的词源	30
2.3.2 纸张、丝绸、瓷器和茶叶	36
2.4 语言交流中的互补、辗转、调整以及难以避免的损耗	42
2.4.1 文化的互补	42
2.4.2 辗转	44
2.4.3 调整	45
2.4.4 难以避免的损耗	46
第三章 北京话的形成及相关问题	49
3.1 北京话的特点	49

3.2	北京的历史	50
3.3	北京的居民	53
3.4	东北地区的居民	56
3.5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语言	59
3.6	北京话和东北话	63
3.7	北京话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历史人文因素分析	65
3.7.1	地理因素	65
3.7.2	移民因素	67
3.7.3	经济文化高速发展	68
3.7.4	民族之间的密切往来	70
3.7.5	北京话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历史人文因素分析	72
第四章	语言使用与社会心理	75
4.1	影响语言使用的社会心理因素	75
4.2	敬称词语分析	77
4.2.1	名实不符现象及其成因	77
4.2.2	语义构造不对称现象	79
4.2.3	词语使用不对称现象	80
4.2.4	词汇系统不对称现象	81
4.3	一般词语分析	81
4.3.1	有标志/无标志	81
4.3.2	两性通称词	85
4.4	詈辞	86
4.4.1	詈辞的构成方式	86
4.4.2	詈辞显示的性别歧视	87
4.5	亲昵词语和亲昵言语行为	88
4.6	禁忌语	91
4.6.1	避讳	91
4.6.2	忌讳	97
第五章	汉字使用中的社会文化因素	99
5.1	汉字和避讳	99
5.1.1	缺笔	99
5.1.2	更换偏旁	101
5.1.3	更换同音字	101

5.1.4	空字	101
5.1.5	关于字音	102
5.1.6	与汉字相关的忌讳	102
5.2	文字狱	104
5.3	拆字测字	106
5.4	女文字	106
5.5	字音演变中的社会心理作用	107
5.6	汉字工具书、文学作品中的“禁忌字”	109
5.7	汉字传播的文化因素	110
5.7.1	汉字系统的其他文字	110
5.7.2	文字传播和宗教	111
5.7.3	拼音和非拼音文字	113
第六章	佛教文化对汉语和汉语言学的影响	115
6.1	佛教传播与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形成	115
6.2	佛教传播与汉语词汇的发展	117
6.2.1	音译词	118
6.2.2	复合构词	119
6.2.3	利用汉语原有词语	119
6.2.4	成语	120
6.2.5	歇后语	121
6.2.6	人名用字	122
6.3	佛教传播对汉语语法的影响	124
6.4	佛教传播对汉语言学的影响	125
6.4.1	佛教传播与汉语语法学	125
6.4.2	佛教传播与汉语音韵学	128
第七章	语言和民族	136
7.1	民族的语言	136
7.1.1	语言差别的差别	136
7.1.2	民族和语言的不对称	138
7.2	民族分离对语言发展的影响	141
7.3	民族交往对语言发展的影响	145
7.3.1	民族交往中的拒绝	145
7.3.2	借用中的民族压迫	147

7.3.3	文字的力量——固有词和外来词，一般词汇和基本词汇	149
7.4	亲属称谓和民族文化	152
7.4.1	现代汉民族各地方言亲属称谓系统对比	152
7.4.2	古代汉语亲属称谓系统	155
7.4.3	几种主要语言亲属称谓词语的比较	157
第八章	语言和地理	160
8.1	地名的语言学分析	160
8.1.1	地名中的借词	160
8.1.2	地名中的古音	163
8.1.3	地名和移民	164
8.1.4	地名的构造	166
8.1.5	地名中的地理历史文化信息	167
8.1.6	市内地名	169
8.2	语言的地理分布	171
8.2.1	稀疏型和密集型	171
8.2.2	连续型和间隔型	173
8.2.3	分界型和混合型	176
8.3	方言过渡：地理的和非地理的	178
8.4	方言之间的差异和地理距离	180
第九章	语言和戏剧	183
9.1	戏曲流行和方言分布	183
9.2	（传统）京剧的字调系统	188
9.3	（传统）京剧的声韵系统——尖团字和上口字	190
9.3.1	尖团字	190
9.3.2	上口字	198
9.4	（传统）京剧中北京语音的表现和影响	202
9.4.1	平翘舌问题	202
9.4.2	入声字和文白异读问题	203
第十章	语言和文学	205
10.1	文学活动对语言发展的促进作用	205
10.1.1	文学活动促进了语言规范化	205

10.1.2	文学活动促进了语体发展	207
10.1.3	文学活动促进了民族共同语的确立	210
10.2	文学作品为语言学研究提供宝贵材料	212
10.2.1	语音研究举例	213
10.2.2	词汇研究举例	213
10.2.3	语法研究举例	217
10.3	语言学研究有助于文学研究	218
10.3.1	语言学研究有助于分析文学作品的版本和作者	218
10.3.2	语言学研究有助于文学欣赏	222
复习思考讨论		225
索引		230
参考文献		237
后记		240

绪 言

很有可能是受到苏联的影响，我国高校的语言学课程过于看重语言结构的分析，而对于语言其他方面的问题，如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联、语言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联，则较少涉及。这种情况至少可以上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这样的内容安排当然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也不利于语言教学自身的发展。我们很有必要为提高学生语言学素质、改进语言学教学进行探索。

本书以语言结构分析为基础，对于语言中蕴含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进行详细的介绍和讨论。第一章“语言和文化”通过实例说明单一的语言结构分析不足以全面解释语言现象，必须从社会、历史、文化诸多方面认识语言，由此引出全书的基本内容。这一章还介绍了语言学中极有影响又很有争议的“沃尔夫假设”。本书认为，对沃尔夫假设的争议可以使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人类语言。第二章“文化交流和语言交流”详细介绍了中外文化交流中的语言问题，作者期望学生从中了解语言与文化的错综复杂关系。第三章“北京话的形成及相关问题”以北京方言的形成为例，详细说明了地理位置、移民、民族交往、经济文化发展对于语言发展的影响。第四章“语言使用与社会心理”分别从敬称、一般称谓、亲昵词语、詈辞、禁忌语方面介绍社会心理对于语言使用的影响。第五章“汉字使用中的社会文化因素”承接上一章的内容，只是从语言方面转向了汉字。第六章“佛教文化对汉语和汉语言学的影响”主要从语体、词汇、语法学、语音学方面介绍佛教文化对汉语言文化的巨大影响。第七章“语言和民族”以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为主，介绍语言与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包括民族语言、方言、亲属语言、民族交往引发的语言演变等方面。第八章“语言和地理”讨论了语言的地理分布特征和地名文化。第九章“语言和戏剧”以京剧为主，讨论方言与戏剧表演的关系以及戏剧语言的特点。第十章“语言和文学”分别从语言发展和语言研究两方面阐释了文学作品的巨大意义，同时也举例说明语言学方法在文学欣赏中的作用。

与传统的侧重语言结构分析的教学内容相比，本书涉及学科领域范围较广，概念表述很难全部清晰精确，教学内容的系统性也有待商榷。此类

重在语言文化分析的课程，其教学方法更是处于摸索之中。为便于使用，本书特附索引，将书中重要概念、人物、著作和相关问题逐一列出页码。本书还仿效丁声树、李荣先生《汉语音韵学讲义》和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的做法，列出“复习与思考讨论”题目，以促进同学的进一步学习。

语言结构分析固然难点多多，但是相对说来，其目标明确、内容单一。而大量涉及社会历史文化的语言学研讨则背景复杂、内容繁多，要做到条分缕析，谈何容易。同学们务必多多阅读相关材料，尤其要关注历史的和现实的语文生活，从中发现规律，从中发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从社会历史文化诸多方面认识分析语言，开阔自己的眼界，丰富自己的学识，再以自己的书本知识去指导社会实践。这才是学习的真谛所在。

作者

2008年2月

第一章 语言和文化

《圣经·创世纪》第 11 章说，最初人类联合起来兴建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们相互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这个古老的传说实质上反映了古人对于语言现象的好奇和困惑。

语言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交流工具。我们每天不知道多少次地使用语言，可是我们未必真正了解语言，正如同我们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空气，可是直到近代化学问世，我们对空气的了解还是很幼稚的。与空气相比，语言在构造、功能以及与人的关系方面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我们把内心的想法变成了一段声波以刺激他人的听觉系统，接到刺激的人又会把这样一段声波在内心里还原为一定的意思。这个生理和心理的过程本身已经足够复杂了，我们至今还远远不能揭示它的机理。而另一方面，每一个语言符号本身又是属于一定社会的。这就使得语言交际过程远比一般的生理、心理过程要复杂。也就是说，语言本身除了生理和心理的属性之外，还具有很多社会属性，如历史的、文化的诸多因素。这也就是本书将讨论的主要内容。

1.1 语言中的文化因素

语言的定义不难寻找。我国教科书中常见的说法是“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这个定义已经成为公认的对“语言”的表述。相比之下，“文化”的内涵就不容易把握。权威工具书是这样解释的：“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这个定义可谓简明扼要，也不难理解。

语言和文化应该属于不同范畴，但是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脱离了语言，文化就无以表现；脱离了文化，语言也就成了空壳。这种紧密联系怎样重视也不为过。本书特别要强调的是后者，即语言中的文

化内涵。让我们随便举出几个例子。

(1)2001年初,中国复旦大学教授、著名核物理专家杨福家被英国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聘为 chancellor。众多中文媒体将此事刊出,称这是中国人首次在欧美名牌大学担任校长职务,是中国学者在国际上地位上升受到重视的有力证明。

(2)2002年1月13日,一向被大家认为身体强壮的美国总统布什短暂昏迷。当天下午,布什总统一个人在白宫休息室观看电视转播橄榄球比赛实况,他边看边吃一种叫做 pretzels 的小食品,不料这个小小的东西把总统先生噎了一下,事有凑巧,总统一下子就昏了过去,好在并不严重,很快就苏醒过来,只是面颊上擦伤了一小块。这件事当然很快就被各国媒体传遍全球。

(3)2003年3月26日,北京市交管局出台新政策:从电脑程序中删除尾数为“4”的车牌号,以使得今后所有新登记车牌不再因尾数为“4”而遭到登记者的抵制。

(4)2007年8月31日晚间,中国著名田径运动员刘翔在日本大阪世界田径锦标赛获得冠军时,中国中央电视台女记者在第一时间采访刘翔的问题也是与近年来社会上所谓象征吉祥如意的数字有关:“你比赛服的号码是441,四加四加一等于九,今天你又被安排在第9赛道,是不是‘9’是你这次大赛的幸运数字?”^①

以上几例足以说明语言问题的复杂性。(1)中国大学的负责人是校长,名称也是“校长”,副职校长是校长的下属,“校长”和“副校长”在汉语中名实相符。相比之下,英语 chancellor 比较“麻烦”,而且它在英国和美国含义不同。在英国一些大学 chancellor 只是名誉校长,每年只是出席结业仪式,不负责学校任何具体工作,这个职位其实是象征性的,往往由皇室成员、著名学者、政界要人来担当,没有实权。学校中真正主事的是副校长(vice chancellor),副校长之下还有若干执行副校长(pro-vice chancellor)负责学校的各项具体工作。chancellor 在美国的一些大学中倒是可以指握有实权的校长,可是美国大学对校长一般称为 president,当然 president 在美国又可以指总统。中国媒体对这一套称谓显然不太熟悉,把杨教授的英国行简单地描述为西方名牌大学聘请中国学者担任校长,引起了国人的误

^① 以上材料分别见于2003年8月20日《环球时报》、2002年4月15日《环球时报》、2003年3月26日《北京晚报》和2007年8月31日晚9:30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现场直播节目记录。

会。其实中国大学体制中不但没有与 chancellor 相当的角色，中国教育制度下的“大学”也不能够简单地与英国 university 等同。西方大学有一定的宗教背景，有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的“特权”传统；中国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都是政府建立的，一切人事、财务、学制等等重要事务都由政府最终决定。这样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的“大学”，在机构设置、人员安排上当然会有许多不同，不是简单的词语含义差别所能够涵盖的。(2)中文媒体称，布什总统被一块“饼干”噎住而短暂昏迷，这让中国读者十分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饼干使得五十多岁正值壮年的总统先生昏倒在地？其实布什总统吃的并不是一般中文读者认同的饼干。中文的“饼干”，英文叫 biscuits，而布什总统吃的是 pretzels。pretzels 在美国中文中一般叫“面条圈”，环形，有面条粗细，深棕色，酥脆，表面有些细小的盐粒，美国人喜欢当零食吃，有点像中国人喜欢嗑葵花籽。这东西不宜翻译为“饼干”，译为“面条圈”也不妥当，因为中文“面条”是白色的黏湿的软绵的，不是能拿在手中的零食。我们似乎找不到合适的中文词去对译这个 pretzels。表面上是这个小小的食品没有妥帖的中文名称，实质上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没有这类食品。这很像汉语的“豆腐”，英语早期译作 beancurd(豆制的凝乳)，十分费解，后来干脆直接音译为 tofu，效果反而不错。(3)车牌号取消“4”，此事在北京市民中引起争论，赞成者说是政府管理走向人性化，反对者说是助长迷信。其实，近年来凡是数字编号一类问题，如住址、楼层、电话、停车位、病床号等等，无一不逢“4”而止、遇“6”“8”“9”则行。商机当然也就应运而生，如手机号码带“8”(象征“发财”)的和带“4”的相比，价格可以高出好几倍。其实这种“恐4症”只是近十来年的风气，至少在老北京话中，“四”不但不“凶”而且“大吉大利”，如“四合院、四平八稳、四喜丸子、四通八达”。(4)中国国家电视台的记者在向全国观众直播的重大国际体育比赛现场电视节目中，以数字是否吉祥作为自己对中国著名运动员的首选采访问题，不过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大众文化风气低俗的一个表现。

很明显，人们可以借助现代科学仪器对空气进行细致的分析、周全的对比、精确的计算，也可以借助仪器去测量人在讲话时的口腔生理运动和语音波形与频率，但是却无法测量出词语背后隐含的全部信息。如果我们想真正深入全面地了解我们每天不可缺少的语言工具，我们就必须在语音、语法、语义构造的探讨之外，在生理基础、物理属性、心理机制的探讨之外，让语言回归到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舞台上，因为语言本是在社会使用的。

1.2 “萨丕尔-沃尔夫假设”

人类研究语言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以前。在古代希腊，狄奥尼修斯·特拉克斯在公元前二世纪就撰写了关于希腊语言语法规律的专书《读写技巧》(希腊语为 *Téchēn grammatikē*，中文又译为《古希腊语法》、《写作术》)。公元前四世纪，古代印度人波尼尼就写出了古代印度梵语的语法书《波尼尼经》。古代中国则早在西周时期就开始编写了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词典《尔雅》。在西方和印度，人们的语言研究工作和主要成果集中在语法和语音方面，而在中国，则突出地表现在词义和文字方面。从现代语言学看，古人的研究工作多是关于语言自身结构的探讨。这样的工作是基础性的，是必需的。不过，因为语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符号，语言不像 10 个阿拉伯数字那样可以轻易地跨越民族跨越时空。任何语言都是在一定时间、一定区域、一定的民族背景下产生发展使用的，这就使得语言研究工作不能不考虑使用语言的不同人群、社会、历史和文化。

到 18 世纪，德国学者卡尔·威廉·冯·洪堡特(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在不同语言之间的结构对比研究基础上提出关于民族精神对比的研究。洪堡特主要学术活动是在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时代。历史比较语言学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发现了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程度不一的基本结构对应关系，由此可以对看似一盘散沙的各种语言进行系统分类，即某些语言之间可能存在共同的历史来源和演变关系，这样的语言应该归并到一类，称为“语系”。亚欧大陆主要的语言可以分为印欧、汉藏、阿尔泰等等，即后世教科书中的九大语系。这是人类第一次系统地认识到自己诸多语言之间的系统关系。

历史比较语言学十分关注不同语言之间在基本结构上的对应关系，这是整个学科的基础所在。洪堡特虽是在这样一个氛围中进行语言研究，并且在语言结构分类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曾经提出了著名的语言三种类型划分的标准：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但他在那个时代中显然是独树一帜的人物。在关注语言结构差异的同时，较之其他语言学者，他倾入了大量精力研究语言和民族的关系。洪堡特认为，对不同民族之间由语言结构差异反映出来的精神发展差异的研究才是语言研究的真正目标。洪堡特的这一观点使得他在语言学历史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他在代表作《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明确提出：

比较语言研究是对语言差异的准确探索……这一探索如果不考虑

到语言与民族精神力量的形成的相互联系，就失去了所有重大的意义。

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式的结合极为密切，只要有一个方面存在，另一方面必定能完全从中推演出来。这是因为，智力和语言只允许并且要求有相互适合的形式。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就是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民族的语言。二者的一致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如果我们无意确定上述二者中哪一方优先，那就必须把民族的精神力量当作现实的解释原则，当作决定语言差异的真实原因。

洪堡特的观点简而言之就是认为语言和人的精神活动、民族的思维特点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想真正认识语言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和民族的精神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几十年后，洪堡特的这一思想在美洲大陆得到了高度的重视。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身兼美国语言学会会长和美国人类学会会长的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 1884—1939)在20世纪美国结构语言学开始快速发展的时期，却非常重视研究语言和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这很像洪堡特当年从语言结构的对比研究转而发展到语言和民族思维的关系研究上。萨丕尔对北美洲印第安人语言进行过多次实地调查，他在分析印第安语言结构时深感英语印第安语言之间的差别不是简单的语言结构可以解释的，而必须和这些语言的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1921年，萨丕尔写成了语言学历史上的重要著作《语言论》，他对于语言和文化的想法在书中已经有所显现：“语言有一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是属于一个种族(或几个种族)的，也就是说，属于身体上具有某些特征而不同于别的一个群。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此时的萨丕尔对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还不十分确定。几年之后的1929年，他在《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收入《萨丕尔论文化、语言和个性》)中就明确表示：

语言是了解“社会现实”的向导。虽然社会科学家通常并不认为语言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语言却强有力地制约着我们对社会过程的所有看法。人类并不仅仅是生活在客观世界中，也不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生活在一个社会活动的世界中，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已经成为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表达工具的特定的语言。认为我们适应现时主要并不靠使用语言，认为语言仅仅是解决交际和思考方面的特殊问题的一种偶然用到的工具，这实在是一种错觉。事实是“现实

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有关集团的语言习惯不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从来没有两种语言相似到可以认为代表同样的社会现实。不同社会所生活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而不是相同的世界只是使用不同的标签而已。

很明显，萨丕尔非常看重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甚至认为不同语言表示的其实是不同的现实世界，而不是同样的世界使用不同的语言。萨丕尔的这一看法，后来得到他的学生，另一位美国语言学家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 1897—1941)的推崇，并且被沃尔夫用近乎数学公理的形式加以表述，后人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设”(Sapir-Whorfian Hypothesis)，也叫“沃尔夫假设”，又称“语言相关性原理”。这一假设的基本内容是：

说话者的语言通过语言系统中可能存在的语法范畴和语义分类，决定了说话者的世界观；这种语言系统是说话者连同自己的本族文化一起继承下来的。^①

“沃尔夫假设”的内容其实有两层意思：其一，语言决定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其二，语言是同文化紧密捆绑在一起继承的。按照这一假设，不同民族之间不仅是语言习惯的差别，而且由此差别造成对世界的看法和思维方式都有很大的差别。

“沃尔夫假设”的内容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我们知道，人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发展完善自己的主观世界。人的认识过程的实质我们还没有探索清楚。语言肯定是我们认识探究主客观世界时不可缺少的工具。但是这个工具对于工具的使用者，也就是人类，究竟有没有影响，有怎样的影响，以目前的科学手段还很难回答。沃尔夫本人把语言的功能说到了极点。他推崇德国哲学家弗里茨·茂特纳的话，“如果亚里斯多德讲汉语或者达科塔语，那么，他所创立的将是完全另外一种逻辑，无论如何，完全是另外一种范畴”。达科塔是美国的一种印第安语。按照沃尔夫这个思路，汉族人、印第安人和欧洲人很可能在思维方式上完全不同。但是这显然是缺少实证的。沃尔夫曾经对印第安人的河比语言(Hopi)做过专门的研究，发现河比语言中对于时间、空间的表达方式与欧洲语言完全不同。他

^① 这个表述引自 R. R. K. 哈特曼/F. C. 斯托克著：《语言与语言学词典》，黄长著、林书武、卫志强、周绍珩译，李振麟、俞琼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

由此推论讲河比语言的印第安人具有与欧洲人完全不同的时空观念，他们的“现实世界”与欧洲人的也就完全不同。沃尔夫曾经说，近年来的物理学发展都是由欧洲人推动的，也就是由讲欧洲语言的人群创造的；而土耳其人和中国人也能够接受近代科学，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欧洲人的推理方法，而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①

沃尔夫的这些观点自问世以来，赞成者少，反对者多。按照他的逻辑，汉语名词没有单数、复数形式的区分，动词也没有现在、过去、将来三种时态，形容词没有级的差别，那么讲汉语的人，其数量观念、时间观念、程度观念就应该与讲英语的人群有着根本的不同。汉语动词没有人称的变化，英语动词只有单数第三人称形式与其他人称不同，而俄语动词有单数的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和复数的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一共六种人称变化，是否也要据此认为，中国人、英国人、俄国人具有完全不同的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人称分别呢？汉语第三人称代词不分男女，采用两性通称的形式 tā（“他”、“她”的分别其实只是书面的，不等于语言中有不同的人称代词），而西方的英语、俄语、法语、德语诸语言都是要区分男女的，那么是否意味着讲汉语的人群和讲欧洲语言的人群在性别差异的观念上也是不同的呢？汉语动词在前，宾语在后，日语正相反；汉语的“吃饭”在日语词序就是“饭吃”，而古代拉丁语由于词形变化繁复，对于词序的要求就非常宽松，是否可以据此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古罗马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动作习惯呢？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沃尔夫当然不可能给出证明，因为他的基本方法还只是思辨而不是建立科学实证。

1.3 语言学的深入全面研究

然而，对于“沃尔夫假设”却不能采取轻易否定的态度。至少在词汇层面，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例证来说明，不同民族之间、同一个民族的不同方言之间在语言表现上的差别其实与这个民族、这个方言区的人群所关注的事物大有关联。例如《红楼梦》第20回中贾宝玉向林黛玉说明自己与其关系较近而与薛宝钗关系较远，理由是“咱们是姑舅姐妹，宝姐姐是两姨姐妹”。这一理由足以说明问题了：贾宝玉之父是林黛玉之母的哥哥，贾宝玉之母是薛宝钗之母的姐姐，本着中国社会传统的男尊女卑原则，当然宝玉与黛玉关系较近，而宝玉与宝钗关系较远。汉语为了表示清楚，特设了“姑舅姐妹”和“两姨姐妹”这两个词语。但是这种关系在翻译时遇到困

^① 引自岑祺祥：《语言学史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